

文史資料



政协长春市宽城区委员会文史办

文史资料第五期目录

1. 我在“皇帝”身边的三十三年
——记溥仪随侍李国雄……………王文锋 (1)
2. 宽城子大营之战……………李野光 (29)
3. 宽城区二道沟历史变迁……………王 迪 (37)
4. 长春市宽城区少数民族教育……………郝延芳 (52)
5. “经济大药房案”始末……………李野光 (64)
6. 我对张景惠的回忆……………张树青口述 谢 力整理 (72)
7. 张景惠二、三事〔续〕……………张树青口述 王久荣整理 (81)
8. 贵阳街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新发史志办 (87)
9. 伪满“将军”吉兴……………王文锋 (90)
10. 小城子轶闻……………任尊正 (102)

我在“皇帝”身边的三十三年

——访溥仪的随侍李国雄

王 文 锋

说明：李国雄，原名李志源。1912年生于北京，1924年8月入北京故官，成为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随侍，在天津、在长春、在伯力、在抚顺，跟随溥仪前后长达33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亲近随侍大李就是指李国雄。此文是根据访李国雄的录音整理而成，他以其亲身经历、亲身见闻，回忆了这段历史的往事，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也许有一些参考价值。

一

13岁那年，当时我还在念私塾，由于家里困难，已无力继续念下去。正巧这时皇宫要招收学吹乐的小孩，我就由一个亲戚介绍，由大人领着经神武门来到养心殿口的东暖阁，一看那里已有20—30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孩站在那里等着呢。过了一会有人说：“万岁爷来了”，但是我们这些小孩都没有看见，实际上溥仪是坐在东暖阁的屋中，隔着窗户向外看着挑选呢。一个太监先出来拉住我，但又有人大声喊说不是，挑选了4—5个之后，最后选上了我，太监把我们领进东暖阁朝西的一个门里，我们就住在这里，并且通知让各自的家中送行李来。我被挑为殿上，第二天就由一个姓杨的领着我们去收拾屋子，用的是很长的墩布，桌子、案子底下只要往里一甩就扫干净了。还要负责倒尿桶等事。进膳时，我们提着类似饭馆那种园提盒（当然这种盒子的造型和工艺是很讲究的）由御膳房提到东暖阁门口。

干了一个月以后，我被提升为溥仪的随侍，就不再打扫卫生，而是专门侍候溥仪了。共分成两个班侍候，平时也没有太多的事，就是晚上坐更，每班2—3个人，所谓坐更，就是在溥仪的外屋地上睡觉。还要负责预备给溥仪换洗的衣服。当了随侍之后，溥仪走到那，我们就跟到那。

入宫时说的是学吹乐，但也就是在开始的一个月内，每隔一天学吹一小时的黑管，当随侍后就不学了。

侍候溥仪两个多月后，正赶上冯玉祥“逼宫”我当时小也不知道害怕。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由两个人扶着来见溥仪说：“要皇上马上搬出皇宫呢！”溥仪随后就要汽车准备出宫。当时站在溥仪出宫汽车车外的有随侍李体玉、祁继忠、曹宝元、五三元和我，是由冯玉祥的军队押着去北府的，走到神武门时，我还看见荣源和冯军的一个军官指手划脚的在谈论着。

到了北府之后，乱哄哄的，住了二天溥仪说北府有煤油味，还问我们大家，但谁也没有闻到，溥仪是怕冯军用煤油烧死他。5—6天后，有人通知我们，说万岁爷让我们回家，并赏给我一块表，我们上去向溥仪磕头谢恩后就回家了。

回家后，没有什么事，但是家长不愿意，还想让我回去侍候皇上，于是我就拿着几包点心去看溥仪。这时溥仪已经到了日本公使馆，我经过日本兵营来到日本公使馆，出来人带我进去见到了溥仪，他问了我的情况，呆一会我就回家了。

回来后不久，溥仪就派殿上杨宗光到我家把我找去。

我曾听说，溥仪是怎样由北府到日本公使馆的。那是在我离开北府半个月以后的事，溥仪借口到麒麟碑胡同看望“敬懿”、“荣惠”两位太妃为名，带几个人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北府，这是做了

一次试探。第二天又以出去看租的房子为名，和庄士敦同坐一辆汽车，后面有兵跟着监视，只好先到东交民巷的乌利文钟表店买了一块金怀表，又以到德国医院看病为名，后在郑孝胥的陪同下，由德国医院的后门溜出，乘马车经日本兵营来到了日本公使馆。结果是连跟着开车的人也无法交待，跟着监视的兵还一个劲的问并大闹了一气。

我来到日本公使馆后，见溥仪表面上还显得挺安静，公使馆专门为溥仪预备了一个小楼，婉容、文绣都住在这个楼里。

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溥仪站在公使馆的楼上往下扔糖果，我当时小就用衣服兜着，接到了一个用糖果做的葫芦。溥仪要吃北京的糖葫芦，就让茶房给沾，溥仪自己也拿着去沾，结果糖汁溅了茶房一手，茶房也不敢言语，这样看溥仪此时心里没有什么不安。

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住了大约三个月，这期间他时常到芳泽公使家去。

溥仪曾说，他早就想从宫里出来。北京宫里有一次轰太监，在这之后，才开始招外面的人，招了我们这些随侍，那时他就想出宫，在此之前他还以赏溥杰为名从宫里弄出去不少历代名人字画和宋版古书。

阴历年前，溥仪给了我50元钱又打发我回家了。

二

我回家过年后呆了一个多月，杨忠光又来到我家说：“万岁爷让你去呢！”我当时以为溥仪还呆在日本公使馆呢，就说呆会就走。杨宗光说“万岁爷在天津呢，我们坐晚上火车走，”这时我才知道溥仪到了天津。

后来我听说溥仪是这样由日本公使馆去天津的。

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出于好奇心，有时在半夜带着随侍祁继忠各自骑上脚踏车，偷偷溜出公使馆到市内各处转着玩，有一次竟转到什刹前海北府门前，溥仪很想跑进去看一看，但又怕被冯玉祥的军队知道，只好溜走了。这之后有一天，溥仪和祁继忠等坐着马车转到了北京车站，在罗振玉父子的陪同下上了火车，上车时还上错了车厢，上了中国军队的兵车厢，车上有好多中国军人，当时溥仪很害怕，但也不好马上下来，车上的军人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溥仪在这节车厢坐了二、三站后，才下来又上了客车车厢，过了一站就有穿黑衣服、黑裤子的人，这站上几个，那站上几个，一站比一站上的多，到天津时，一车箱几乎全是穿黑衣服的人，就连溥仪自己也觉得奇怪，实际上这些全是日本警察。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包围着裹出去了，他们见到中国老百姓是拳打脚踢，溥仪被护送到天津的大和旅馆，后又由大和旅馆搬到张园。

我由北京来到了张园，继续侍候溥仪。那时我记着，从前的老臣胡嗣源、罗振玉、荣源等常去。据溥仪讲，那时的生活主要是靠卖东西和大臣们进贡。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是18元，但是有时钱紧，要几个月才给我们开一次工资。溥杰从宫里带出去的字画、珍宝等存放在天津戈登路溥仪父亲载灃住的116号楼里。罗振玉，佟济煦就拿这其中的古玩等出去卖，他们从中时常作弊，有时以假换真，有时多卖少报。

溥仪在天津时所买的楼房有11—12所，共有100来间，全在日本租界内。在张园时，英、美、法等国的文、武官员和溥仪有来往，彼此还互相宴请。溥仪在去参加英皇加冕的庆贺宴会，还观看了英国飞机表演。

在张园溥仪过“万寿节”请了英、日、法领事和军人等好多人。有一次，大约是溥仪20周岁那年，上午设宴招待，下午还在三楼看魔术表演，有大变活人、枪毙活人等。

溥仪有时坐车外出到英、法租界去买手饰、衣服等，有时还去英国的跑马场，此处中国人是不许进去的。溥仪开始去时，门口站岗的印度人还拦着看看，去常了，他也就不看了。跑马场是公园的性质，里面有饭店和各种玩的设施，溥仪去时，一般就是带一、二名随侍。但是有一名日本警察，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永远跟着。溥仪自从到了张园，就有专门的日本警察监视他，溥仪外出，日本警察总是穿着便衣跟在后面，我们当时称日本警察叫白帽。

溥仪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妹妹都穿着打高尔夫球的运动装，去高尔夫球场玩。打球时，溥仪三妹的球杆碰破了溥仪的左眉骨处，血马上淌了下来，吓得他几个妹妹立即用手帕捂住伤口，叫我马上去把汽车带过来，由那直接开到德国人开的医院，德国籍的白大夫，要给溥仪缝两针，溥仪不同意，结果他的左眉上角落下了一决小疤。

淑妃文绣开始在张园时和溥仪的感情还不错，有一次文绣经溥仪准许出去剪发（剪了新式的短发）坐汽车回来后还让溥仪看剪的怎么样，溥仪看了之后还很高兴。

婉容对溥仪紧着把持，是为了他“正宫娘娘”的名分。在静园时，有一天文绣请假出外买东西，回来时正巧溥仪和婉容在院子里，文绣往地下吐了一口，就回到她的房里去了（她单住一个小楼）。溥仪让我去指问文绣：她为什么唾人？我就去了，因为我是皇上派来的，所以文绣规规矩矩的站着，听我的训斥。这之后过了些日子，文绣的心情始终不好，经溥仪批准，文绣在她妹妹陪同下

出去玩，就再也没有回来。

溥仪总是想甩掉“白帽”出去玩，张园有一个戏台，在戏台后面有一个小角门，但这个角门总锁着，天长日久，就锈死了。溥仪让我去弄开，看看外面有没有人，我站在角门那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就没敢动手，回来报告溥仪，他气的打了我两个嘴巴。后来门锁被另一名随侍王三元弄开了，溥仪和王三元晚上从这个角门溜出去好几次，不知出去玩什么，但他们没干好事。不久王三元突然长了芥，溥仪的腿也不知长了什么，开始烂了，佟润泉和徐思允这两名“御医”都没治好，又从北京请来了回族医生哈瑞川，总算才把腿治好。

王三元欺负我，有一天我就和溥仪说：“我不想干了”，溥仪说：“那你就卷铺盖”。我心想这下可好了能回家了，当时我住在溥仪住的外屋，我就回去收拾行李，溥仪一看我真的要走就说：“你想走，不跟我行吗？”那时还没有让我们之间互打呢，所以溥仪亲自动手打了我一顿，一个劲地问我回不回去了，直到我说不回了才住手。

有时你也弄不清溥仪是什么意思，还给我们点小恩小惠。溥仪在天津日租界的正金银行有存款，一天他把我们几名随侍都叫了去。说：什么事你们都得靠我，每人赏你们1000元钱，先给你们存在银行里，利钱先给你们，我就得到了80元的利钱，以后这笔钱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1929年夏天，溥仪又搬到了协昌里的“静园”，这个名字是溥仪起的，是“静中待变”的意思。

溥仪还跟霍庆云、霍殿阁练过一阵子武术，但溥仪没有正经跟着练，练了几次就不练了。我当时也在练武术，大约是在1931年的初冬，

有一次我练8斤的泥球，砸坏了脚，请假回北京休几天。

三天后，我就由北京往回返，一上火车，就听说天津事变了，但究竟怎么事变是不清楚的。下午两点钟上的车，一直走到晚上九点钟才到了天津，下车后，旅客又都被赶到了候车室，外面有警察把着不让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才放行，一出车站才知道，日本租界戒严了。只好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了法租界，在日、法租界交界处有一家金银首饰店，我陪溥仪曾到这里买过首饰，一问老板得知日租界中午才能放行。我等不及，就绕着往前走，走过一个大楼一转弯一看已经进入日租界的铁丝网，正在这时一个日本兵端枪走过来，还没等我说话，又过来一个中国兵，我就问他：我去静园这么走对不对？日本兵以为我们认识呢！我就这样混了过来。回到静园，溥仪看到我很高兴地问：“别人都进不来，你怎么转进来的，你回来的正好，我今天就要走了”。我赶紧问“老爷子到那去？”溥仪说：“去哪你甭管，我也不知道去哪。”

这天下午溥仪又告诉我：“我今天晚上走，晚上不让开车的佟公勇进来，让他在东房外等着，按着你想的那个办法，我藏在跑车的后箱里，到时你把车后箱盖盖上。”天黑以后，溥仪从楼上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进了车房后我扶着溥仪上车，溥仪那时不怎么那么灵，一窜就上了车，钻进了后箱里，跟着后面那个人也上来往里钻，我一看才看清是祁继忠，两个人钻在后箱里，外面还露着半截身子，我使劲往下按，才关上了后箱盖。这是一辆双座的敞篷车，平时这个后箱支起篷来还可以坐两个人，不用时往下一盖就成了平的。

关上盖后，我走出车房，让佟公勇进去开车出来，佟是看到有两个人进车房，他也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马上开车出了

静园，我一看，后面还紧紧地跟着一辆车。

过后，我听佟公勇说他当时心里害怕，一转弯就撞在电线杆上了，车开到敷岛料理店前就有人把车拦住，把他轰下车，站在一旁。等把后箱里藏着的人放出来，盖上盖，才让佟公勇把车开回来。

溥仪走后，下面的人渐渐都知道了，但每天该传膳还传膳，因为溥仪走之前，曾这样吩咐过，饭菜没人吃，我们也不敢吃。

静园剩下的是皇后婉容，但奇怪的是王爷（载沣在溥仪走后也住在静园。因为当时王爷住在天津英租界的戈登路，他每次到溥仪这来，就是看看、玩玩、吃顿饭，晚上就走了，从来没有在静园住过。这次却住在静园，所以说溥仪走王爷是肯定知道的。

溥仪走后的第三天，婉容坐在楼廊门口的椅子上把我叫了去说：“皇上、王爷都走了。”这时我才知道王爷走了。婉容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没有人管我了，怎么办呢？”我当时也弄不清，婉容为什么和我说这些，只好拿着手绢给他擦泪，婉容最后说：“只好等信了”。

半个月后，由胡嗣源带来一封溥仪的亲笔信，内容很蹊跷，大致内容是：我由天津到○○，又到了○○（意思是溥仪由天津到了营口，又到了旅顺），并命令把婉容也送去。等二天，我在楼上看到了院子里来了一名美男子，戴着礼帽，穿着西服，由人领着来到婉容屋里，呆了一会就走了。婉容马上把我叫去说：“来的那个美男子，你见过没有？那是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即川岛芳子）女扮男装。我今天晚上也走，你给我收拾收拾，照送皇上走的办法送我。”

当天下午，天津日本驻屯军翻译吉田又来告诉我：“今晚上你

开车，在旭街有人等你”。

天黑以后，婉容自己从楼上下来，钻进了车后箱里，这次倒是比较容易就盖上了盖，这车仍是溥仪的那辆，我把车开到了旭街西口，一转弯刚停车，就有人迎上来，我打开了后箱盖，婉容很灵活地跳了下去。路旁的一个大门打开，十四格格，着女装迎出来，她的脖子上还戴着一串钥匙。我问婉容还有什么事，婉容说狐狸皮围脖忘带了，让我回去给取来。我就开车返回静园，取了围脖之后，又步行送到十四格格的住处，往回走时，心里真痛快，主人都走了，没人管了。快到静园时，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把我吓得马上跑回了静园，这就是第二次“天津事变”。

几天后，又接到了溥仪传来的“旨意”，让我再送走两个老妈子和厨房的几个人。怎么送呢？让我去驻屯军司令部找吉田翻译，给我拿了个空信皮，无信，信皮上有“清宝驻津办事处”等字样，驻屯军司令部的门岗看我拿着这个信皮，就让我进去见到了吉田，他给我开了护照，并告诉我千万要藏好，不要让中国军队知道，路上有什么事，可找驻屯军，拿着护照到塘沽上船就行了。

当天晚上，我就把那几个人送到塘沽的日本船上，我们上船时，日本人也没有问，看来他们早知道。

大约是在年底，罗福葆来天津传达了溥仪的“口谕”，让我也去东北，我和罗福葆等一起乘坐日本船去了大连。

三

到大连，有人带着我们坐车到了“墨缘堂”此处是罗振玉开的书画店，不一会我见到了罗振玉，随后我们一起坐出租汽车到了旅顺的肃亲王府，门的钥匙由日本警察管着。溥仪见到我说：是李国

雄来了，我挺想你的。溥仪让我住在楼上他住的外屋，楼下住的是护军。

在这里，溥仪有时到海边去，我们捞海参，溥仪还让我开海参膛，有时还到白玉山去玩，看俄国军队的战壕。

过了些日子，溥仪派我和霍庆云、高香亭回天津去取宝星。到天津见到吉田翻译，他说：“你们是来取宝星的吧！”看来日本人是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

宝星是溥仪在天津时自己画的样子，在英租界一个卖钟表手饰的地方特作的。四寸宽、八寸长、二寸厚，两个宝星是用一个红匣装着，宝星其实也就是勋章，是六角形的，每个角都镶着一个带宝石的星。我还按照溥仪的吩咐，把他从英国买的那只黄虎头狗——胖头也带上了。

溥仪在天津时有三辆汽车，一辆淡青色的赛车、一辆兰色的别克轿车和一辆黄色轿车，吉田要坐这辆黄色的轿车送我们去塘沽，因为这是溥仪的专用车，我不敢坐，吉田说：这有什么呢？便硬拉着我上了车。上车后，吉田把我们送到船上，我们虽然带着狗，可是一直没有管，一般人在当时是绝对办不到的。到大连时因海水退潮，船不能靠岸，我们暂不能下船。突然有个日本人要瞧“宝星”，也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只好拿出来让他看看。

回到旅顺后，我把宝星和狗交给了溥仪。1932年2月底的一天，溥仪把我们这些随侍都叫了去说：我要去长春了，祁继忠留下和我一起走，你们其余的人收拾收拾，先到长春去准备。我们带着行李、箱子，还给溥仪带一匣子桔子直接来到了长春，住在七马路的“执政府”也就是长春道尹衙门，这时还没有布置完，正忙着准备呢，虽然是一栋破旧的大宅院，但布置的却很华丽。

溥仪后来对我们说：他由旅顺没有直接到长春而先到汤岗子，主要是因为溥仪坚持要当“皇帝”，日本人让当“执政”，就卡在这了，郑孝胥和罗振玉之间也有分歧，最后在坂垣的威胁下，溥仪只好答应暂任“执政”一年，一年期满再实现帝制。

溥仪到长春的第二天，就在道尹衙门的一间大屋子里举行了“执政就职典礼”。参加典礼的人不少，有溥仪的旧臣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源等，还有原奉系的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坂垣等人也都来了。到院子里举行了升旗仪式，溥仪身穿黑色西装大礼服站在旗杆下，他身后还站着好些人，旗杆有6米多高，由赵欣伯升的伪满国旗。

当时出入执政府凭黄牌或白牌，戴黄牌的是高级官员，此牌是白地铜边有“执政府”三个红字，戴白牌的则是一般官吏。

溥仪当“执政”后不到一个月，在四月初就搬到了“吉黑権运局”这里又成了“执政府”（年后改称帝官）。是我和几名护军先去的，住在宫内府那个小院里，溥仪来时也是先住在这，后搬到缉熙楼，这个楼名是溥仪起的，是继承康熙的意思。溥仪未搬到缉熙楼之前，曾有人要在此拍照，我把他阻拦住说：“皇上住的地方怎能照像。”

刚开始在执政府溥仪出去还是比较随便的，有一次溥仪到南关，还进了一个老百姓家的院拍了拍院里的小孩，之后就有人说，这小孩真有造化，能让皇上摸摸。但是过了不久，日本人的控制就严起来了，一次，我们陪着溥仪去大同公园，刚进公园，日本宪兵就从后面追上来，说这里不安全，请皇上马上回去。

溥仪根据康熙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祖训，把他的办公楼取名叫“勤民楼”。伪满初期，溥仪还经常去勤民楼办公，但

后来也许是无公可办就渐渐不去了。另外溥仪从他的寝宫——缉熙楼到勤民楼仅有40多米远，但溥仪每次往返后面都跟着侍卫官、侍从武官一大群人，勤民楼和中和门之间“宫内府宪兵室”的日本宪兵又在时刻监视着，这无形中也是对溥仪的一种限制。

伪满初期，马占山当时是军政部长，他曾接连两次来见溥仪，第一次来是在溥仪寝宫缉熙楼客厅见的，呆了几分钟就走了。溥仪对我们说：“这次马占山是来向我辞行的，他哭着给我叩了头，说他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并叮嘱我们此事绝不可以外传，至于马占山要到那去的详情，溥仪没有说。过了几天，报上就登出了马占山反满抗日的消息。

1932年5月，国联李顿调查团来时，溥仪开始很高兴，以为各国一承认，自己就能站住脚了，会见是在勤民楼的正殿内，溥仪的脚下还铺着一张白熊皮。溥仪会见调查团后说：“当时曾想说点别的，但坂垣他们都在场，只好按照他们事先讲的说，李顿他们什么也没说，只说了有些事需要研究研究。”

1933年初，溥仪以从天津带来的10几名保镖的为基础，又从各地挑选了300多名年轻人，成立了“护军”，护军是在“帝官”之内站岗的卫队，“帝官”外面是由“禁卫步兵团”负责。护军分成三个队，每队102人，由三个队轮班站岗。护军归警卫处处长佟济煦管，溥仪让我兼任护军二队队长，一队队长是吴天培，三队队长是魏树桐。我前后当了四年护军二队队长，但我还得干随侍的活，只不过在溥仪那呆的时间少了一些。护军的队长相当于伪满军队中的连长，军衔是上尉，但护军高一级，所以我的军衔是少校，但是不知溥仪出于什么心理，不让我们带少校的肩章，只准我们带上尉的肩章但军政部给我做的礼服上是少校的肩章。我当随侍的工资是

200元，但当护军少校队长军政部每月只给130元，差的那70元溥仪按月给我。

护军的编制和北京皇宫的“护军”不一样，我们不论在武器装备、教育训练上都是采取了正规陆军的方式。溥仪还时常给护军“赏赐”要求我们尽忠于他一人。

我当护军队长一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前。这一年的7月初，当时我正在北京瞧病（此时我向溥仪请假回北京看病已一个多月了）突然收到了溥仪让司房毛永惠给我打来的电报说有要事叫我马上回去。我回来见到溥仪他说：“护军出事了，在大同公园和日本人打起来，日本人说是你支持护军二队打日本人，我和日本人说你在北京呢，所以才没有抓你。”这时我的护军队长已被撤掉，警卫处长佟济煦也被革职了。

护军事件的详情是霍庆云对我讲的。那天是周日，一队执勤，二、三队放假，三队去儿玉公园，二队去大同公园，玩了一会队伍就解散了，大部分人都上街了，大同公园里剩下不到20人。

打仗的原因，是由四名护军租船引起的。管船的是个朝族人，四名护军租了一条船，刚划出不远，那个管船的人就高声喊“不许四人同船！”于是，便有一名护军下了船，小船再划走后还不到两分钟又被召唤回来：“三个人也不行！”船上只剩下两个护军了，还是不许划。

一名护军从船上走下来指着湖中别的船问：“为什么别人三个人、四个人一条船都行？我们两个人同船都不行？那个管船人喝的是醉熏熏，没理护军的问话，竟操起一只啤酒瓶子照着护军打了一下，瓶子都打碎了，四名护军一看自己吃了亏，那里肯依？追上去要打他，这个管船人转身钻进了售票室关上门。护军围着售票室评

理叫号。

这天可能是个什么节日，附近有一百多名日本兵正在野餐，他们听到喊声借着酒兴已经围拢过来。

四名护军在售票室外喊了一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打伤，就往回走了，正迎上走来的那群日本兵，指问护军方才为什么打日本人，不容分说，拉过护军就打，几个围打一人，护军被迫还手，并发挥了武术特长，双方就这样打起来，人越聚越多，在公园里的其他10几名护军也聚拢过来，参加混战。打退了这群日本兵，护军就趁机往回走到了一个桥上，迎面又赶来一伙日本兵，领头的是个宪兵队长，手里还牵条军犬，喝问你们为什么打日本兵，护军就讲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日本人从他们穿的军装上知道他们是护军，就问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护军回答说：“你管我叫什么呢？”因为护军的帽子上有姓名，这个日本宪兵队长就抢去护军的帽子，这名护军一一看就急了，又反抢过来，这样就又动手打起来，这个日本宪兵队长放开军犬向护军身上猛扑。一名护军飞起一脚就把那条军犬踢得鼻口淌血，倒地而死。那个宪兵队长就上来打这名护军，被护军脚踢在胸脯上，又是一场混战，日本兵被打得狼狈不堪。护军们打完后就回官了。

护军刚回到“帝官”，日本宪兵队抓人的汽车就来了，向溥仪要打仗的护军。溥仪后来曾说，我当时也护不了他们，只好交出了11人。他们被带到了宪兵司令部，审问他们的正是被踢了一脚的那个宪兵队长，对这些护军动用了各种酷刑，并把他们的衣服全部剥光，问他们为什么打日本人，一个护军说：“我早就想打日本人！”那个中国翻译没有译这句话，走上去打了这个护军一个耳光说：“混蛋，你还要说什么。”

当时日本宪兵要把这些护军全部枪毙。溥仪请吉冈代向关东军求情，最后算是赏给溥仪一个面子，但要求撤换护军负责人，把打仗的护军赶出“国界”；向受伤的日本人赔礼道歉。之后，一个日本人接任了警卫处处长的职务，由于我出事时不在长春，算是从轻发落革职了事，又回去当我的随侍。

四

1934年3月1日，溥仪举行“登极大典”，早上，我在寝官先侍候溥仪换上了从北京老太妃那取来的光绪穿过的龙袍，是绣着五彩云霞的玄狐毛皮的蓝色长袍，还绣着袞龙和“万寿”字样。随后我就先领着护军来到杏花村祭天场，那天我也穿着新做的礼服，红呢子裤子，兰呢子半身大衣，肩章是金丝的。高筒的大皮靴。祭天的“天坛”是临时用土堆的一个土台子，溥仪来的时候，我们全体立正举枪，溥仪走上了这个土台子只是叩了几个头，祷告了一番，一会的功夫我就陪着溥仪回到了“帝宫”，在缉熙楼溥仪又脱去龙袍换上伪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来到勤民楼二楼的正殿内举行了“登极大典”当时满影还特意来拍了纪录片。我还得到一枚“帝出乎震”的登极大典纪念章。

“登极大典”后不久，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来到了长春，我带着护军二队在火车站列队迎接，那天我们穿的是骑马的礼服，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没让骑马，不让带枪，每人手里拿着一个两米多长的仪仗杆，上面挂着一面小的日本旗。火车进站停车后，车门正对着溥仪在站台上站的位置，秩父宫下车和溥仪握手，然后他们顺着铺的长条地毯向我们走过来，我就喊：“立正！举旗！”

第二天上午，溥仪和婉容在勤民楼正殿内与秩父宫举行了会见